

城市史视野下的南宋临安研究(1920—2013)

姚永辉

〔摘要〕宋代是中国古代城市乃至历史发展的转折期。以“唐宋变革”的讨论、宋代历史地位的重估及现代城建的需要为背景,南宋临安研究成果颇丰,不啻为百年来学术史变迁的折射。近年,随着南宋史日益为学界所重,愈加凸显南宋都城临安的研究价值。多元视角的引入,在催“活”城市史研究的同时,也使其他专门史分支领域获得突破。此外,研究者对既有框架和模式展开反思,试图提出一些新的方向以推进讨论。有鉴于此,笔者整理了近百年来关于南宋临安研究的主要文献,着重聚焦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热点问题展开评述,并引介部分海外学界的最新成果。

〔关键词〕南宋;临安;城市史

〔中图分类号〕K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4)05—0169—10

〔作者简介〕姚永辉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国学院讲师 311121

城市变迁折射文明兴衰的历史进程。“城市史视野下”的研究文献,与“城市研究”所辐射的范围不尽相同。^①中国城市史研究,“远可追溯到中国古代沿革地理对于都城、城市的记录和考察”,^②如《洛阳伽蓝记》、《长安志》、《唐两京城坊考》、《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等广义的城市史著述,^③狭义则指近代意义上的城市史研究,学界多就后者言之。简言之,城市史“侧重于城市兴起、发展与演变的历史过程”,^④研究“城市社会和文明之兴衰”,“当研究的目光投向城市时,城市不只是一张线形图,也不是一张平面图,而是一个结构,一个系统,一个动态的立体社会。研究者的视野必须占有整个城市社会、城市文明及其历史”。传统史志受行政区划的限制,是“以地方为范围的编年性的通史或政治史”,而城市史则“是以城市文明发展为主轴的专史”。^⑤

中国城市史研究发端于20世纪20—30年代,学科建构则在80年代。无疑宋代是中国古代城市乃至历史发展的转折期。作为11至13世纪的繁华都会,南宋行在所、实质意义上的都城临安,20世纪初即为研究者关注。百年来,以“唐宋变革”的讨论、宋代历史地位的重新评估,以及现代城市建设的需要为背景,^⑥宋代城市史尤其是开封、临安研究成果颇丰,不仅在城市考古与复原方面取

① 中国城市史学的发展脉络,可参读皮明庥《城市史研究略论》,《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隗瀛涛《中国城市史纲》“前言”,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页;毛曦《城市史学与中国古代城市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2期;熊月之、张生《中国城市史研究综述1986—2006》,《史林》2008年第1期;何一民《历史时空之城的对话:中国城市史研究意义的再思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6期;毛曦《城市史研究的范围和方法——试论历史地理学、古都学及城市史学之关系》,《史林》2009年第4期。

② 毛曦《城市史学与中国古代城市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2期。

③ 熊月之、张生《中国城市史研究综述1986—2006》,《史林》2008年第1期。

④ 李孝聪《历史城市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页。

⑤ 皮明庥《城市史研究略论》,《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

⑥ 梁元生将这种史学家出于对公共事务和集体利益的关注下所作的研究列入公共或公众史学的研究路径(Public History)。梁元生《城市史研究的三条进路——以上海、香港、新加坡为例》,《史林》2007年第2期。

得重大突破,更经历了从偏重都城地位及繁荣面貌的梳理,到强调问题意识的多学科交叉研究的转变。^①近年,随着南宋史日益为学界所重,及宋元明变迁的讨论推进,海内外交流中,愈加凸显南宋都城临安的研究价值,出现了许多热议并推动研究的论题,有些海外成果亟待引介。

一 南宋临安城市史的整体研究概况

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中国都市小史》一文,^②可谓“萌芽状态的城市史”书写,^③文中述及宋代杭州市政、商业和对外贸易等,认为“古都市状况,其资料较多者,惟南宋之临安”。^④相对丰富的传世文献,使民国学人考述南宋临安城的基本史实时就能较为细致地展开。总体说来,我们可将近百年的南宋临安研究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20世纪20至70年代,依赖传世文献,尤其是正史、地方志、笔记、诗文等,偏重描述南宋临安的社会经济生活,日本学界主要在唐宋变革的范式下讨论南宋临安在城市形态格局等方面的变化和影响,形成了某些后期发酵的重要命题,其他海外学界开始译介南宋临安的文献资料等。

临安三志、诗文笔记《马可·波罗游记》等为南宋临安城市史的研究提供了相对丰富的资料。^⑤民国学界,张其昀、全汉昇、孙正容、张家驹、杨菲等多利用上述文献考察南宋临安的城市生活以展示都市繁华,其中张其昀开始注意分析宋元临安从繁华到凋敝的原因,指出火灾之弊是最大的问题,全汉昇注意到城市治理管理等问题,但总的来说,此阶段的研究偏重资料梳理和描述。^⑥50年代以后的台湾学界,费海玘开始探讨南宋临安城的厢坊布局、商铺位置及房荒问题等。^⑦日本学界的南宋临安研究深受内藤假说的影响,多以唐宋变革的范式解读南宋临安,加藤繁、曾我部静雄、斯

① 有关宋代城市史研究情况或学术史批评,部分可参读曲英杰:《近年来中国古代城市问题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7期;曲英杰:《近年来古代城市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9期;朱士光:《八年来中国古都学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日]太田幸男:《近年来日本对中国古代城市的研究概况》,《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曲英杰:《近年来中国古代城市研究的新进展》,《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2期;[日]平田茂树:《宋代城市研究的现状与课题——从宋代政治空间研究的角度考察》,《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2期;[日]中村圭尔、辛德勇主编:《中日古代城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127页;吴松弟:《大陆中国における宋代都市史研究回顾(1949~2003)》,井户有纪译,《大阪市立大学东洋史论丛》14号,第19—50页,2005年3月;[美]熊存瑞:《古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新成果》,蔡云辉译,史明正校,刘海岩主编:《城市史研究》第23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杨贞莉:《近二十五年来宋代城市史研究回顾(1980—2005)》,《台湾师大历史学报》2006年第35期;包伟民:《唐宋城市研究学术史批判》,《人文杂志》2013年第1期等。

② 梁启超《中国都市小史》,《晨报》周年纪念增刊1925年第7期;此文又分两次发表于《中国之都市》,《史学与地学》1926年第1期,《中国之都市(续)》,《史学与地学》1926年第2期;后又有《中国之都市》,《新书月刊》1948年第3期。梁文叙述了从先秦到民国城市形成及市政管理、主要的商业城市、唐宋中国十二大沿海都市、通商及侨民掌故(包括宋时杭州番坊)等问题。

③ 傅崇兰《序》,傅崇兰、孟祥才等编《曲阜庙城与中国儒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④ 梁启超《中国都市小史》。

⑤ 临安三志的考证研究,参读朱士嘉:《临安三志考》,《燕京学报》1936年第20期;朱士嘉:《宋临安三志版本考序》,《燕京大学图书馆报》1936年第98期;朱士嘉:《宋临安三志版本考》,《文澜学报》1937年第3卷1期。上述三文内容有重合;陈杏珍:《〈淳祐临安志〉的卷数和纂修人》,《文献》1981年第3期;黄苇:《论临安三志》,《方志论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1—144页;林正秋:《南宋行都三志》,浙江地方史研究室编《地方志与方志学》,1983年;林正秋:《南宋〈咸淳临安志〉述略》,《文献》1990年第3期;郝秀荣、丁延峰:《丁丙藏宋本〈咸淳临安志〉考略》,《新世纪图书馆》2006年第4期;丁延峰、郝秀荣:《海源阁藏宋本〈咸淳临安志〉散佚考》,《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06年第1期。[日]高橋弘臣:《南宋〈临安志〉を読む》,爱媛大学资料学研究会编《歴史と文学の資料を読む》,创风社2008年版,第102—121页。

⑥ 张其昀:《南宋都城之杭州》,《史地学报》1925年第3卷第7期;全汉昇:《宋代都市的夜生活》,《食货》1934年第1卷1期;孙正容:《南宋临安都市生活考(上)》,《文澜学报》1935年第1期;张家驹:《宋室南渡后的南方都市》,《食货》1935年第1卷第10期;杨菲:《南宋时的杭州》,《杂志》1944年第13卷第6期。

⑦ 费海玘:《南宋临安生活简介》,《大陆杂志》1959年第19卷第1期。

波义信等积累了对后世影响甚大的研究成果,后文将具体述及。^①其他海外汉学界,除了文献翻译(如A. C. Moule曾介绍《马可·波罗游记》中对临安的描绘)之外,^②谢和耐(Jacques Gernet)所著《南宋社会生活史》(中国大陆版译为《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是比较重要的著作,^③内容几乎全部围绕南宋临安与都人日常生活展开,试图回答中国人的气质及文明发展进程等问题。

第二,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在南宋临安考古发掘、城市复原成果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出现了几部临安综合研究的专著,“唐宋革命”与“中世纪城市革命”等讨论框架在临安研究中被论证、辩难,研究者倡导跳出范式,探讨史料与问题结合的新的可能性。

20世纪80至90年代,古都著作中多有涉及南宋临安者。除此,南宋临安综合研究的专著主要包括:林正秋《南宋都城临安》,运用正史及笔记等,考述定都临安的原因、皇宫官府、工商经济、风俗人情、城市建设等,并就有分歧之处(如皇城边界)等提出看法。^④周峰主编《南宋京城杭州》,选录80—90年代南宋临安的论文,涵政治、经济、文化等,附录南宋临安大事记、城坊布局等图表。^⑤步入21世纪,徐吉军撰有《南宋都城临安》,区别于其他同类著作的特点在于:传世文献与考古资料并用;补充考辨都城规划与营建、都城管理、市政建设等内容;总结并回应学界讨论的一些热点问题。^⑥杭州南宋史研究中心推出了一批南宋临安研究的论文集和专著。

南宋临安城的考古发掘几乎持续了30年时间,取得重大突破,城墙、太庙、御街、宫殿、三省六部、府学、临安府治、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白马庙等的发现和持续发掘,纠正了传世文献中的某些记载,如证实馒头山仍有宫殿建筑等,城市布局得以更加清晰的呈现,将研究推向可以利用考古实证的新阶段,^⑦如董军从古籍文献、两宋绘画、南宋御街考古报告等展开复原,讨论了御街的总体轮廓、布局形式等问题。^⑧历史地理和城建领域也多有创获,魏嵩山《杭州城垣变迁示意图》为海内外学界所关注;^⑨《中国城市建设史》所附《南宋临安城复原想象图》常被作为新绘制图的底图;^⑩阙维民1987年完成《南宋行在临安府复原图》,^⑪参照《咸淳临安志》、史料、现代考证文献编绘而成,^⑫在此基础上又绘制“南宋临安坊巷图”。阙维民强调要充分利用京城图,需要正确判读方志地图,并依据野外考察经验,将方志地图的主题内容转译至现代地图,仅靠文史资料而缺乏考察的编制容易出

① 如加藤繁《宋代都市の発展》(原载《桑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1931;后收入氏著《支那經濟史考證》上卷,东洋文库1952年版。中文版有《宋代都市的发达》,陈望道译,《新中华》1934年第2卷第21期、第22期。《宋代都市的发展》,吴杰译,《中国经济史考证》,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39—269页)、曾我部静雄《開封と杭州》(《支那歴史地理叢書》七,高山房1940年版)与《宋代經濟史の研究》(吉川弘文馆1974年版)、斯波义信《宋代商業史研究》(风间书房1968年版)等。另外,日比野丈夫记述了“宋代都市生活的一面”以及“关于宋代临安的备忘录”(日比野丈夫《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同朋舍1977年版)。

② [英]A. C. Moule, “Marco Polo’s Description of Quinsai,” *Toung Pao*, Vol. 33, no. 1—5 (1937), pp. 105—128 (24). A. C. Moule曾与Paul Pelliot(伯希和)合作编译*Travels of Marco Polo: Marco Pol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London: G. Routledge & sons, Limited, 1938.

③ [法]谢和耐《南宋社会生活史》,马德程译,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该书最早为法文本,1959年在巴黎出版;后由H. M. Wright译为英文,1962年版。该书另有刘东1995年中国大陆译本,《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④ 林正秋《南宋都城临安》,西泠印社1986年版。另有傅伯星、胡安森《南宋皇城探秘》,杭州出版社2002年版;傅伯星:《宋画中的南宋建筑》,西泠印社出版社2011年版等。

⑤ 周峰主编《南宋京城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此书最早由政协杭州市委员会办公室编辑,1984年内部发行,后杭州市政协主席周峰将其列入《杭州历史丛编》,由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后又有1997年修订本,增加了一些文章与图。

⑥ 徐吉军《南宋都城临安》,杭州出版社2008年版。

⑦ 参见唐俊杰、杜正贤:《南宋临安城考古》,杭州出版社2008年版。

⑧ 董军《南宋御街复原研究》,《山西建筑》2009年11月。

⑨ 魏嵩山:《杭州城市的兴起及其城区的发展》,《历史地理》创刊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7页。

⑩ 同济大学城市规划教研室编《中国城市建设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48页。该图也常被研究者作为底图,如朱玉麒“《碾玉观音》中的临安都城地理空间示意图”即由此改绘,见《隋唐文学人物与长安坊里空间》,《唐研究》第9卷,第120页。

⑪ 该图原拟编入《中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第1册)。

⑫ 阙维民《南宋行在临安府的地图再现——历史地图学个案研究》,《历史地理》第1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6页。

问题,指出林正秋《南宋都城临安》书末所附数幅历史地图,河流、城墙的表现上都存在明显错误。

20世纪80年代,日本学界对南宋临安展开城市景观复原研究,梅原郁主编《中国近世的都市与文化》中收录部分重要成果。^①梅原郁清楚表明了自己的关心所在,即之所以力图再现南宋临安府的城市面貌,是期望“以此作为深入研究的台阶,绘制出更加精密的临安地图,并把它与明清时候的情况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作业”,^②侧重描述了临安的宫城营建、水路与桥梁布局、厢坊设置、身份与住宅区域、南渡后的开发区及公共设施、临安附属郭县的变迁等。另外,斯波义信《宋都杭州的商业核》、竺沙雅章《宋元时代的杭州寺院和慈恩宗》^③、衣川强《杭州临安府和宰相》、本田治《宋代杭州及周围地区的水利和水利组织》、宫泽知之《宋代的城市商业与国家——市易法新考》等从不同角度展开考述,^④提供了不少具有参考价值的图示,如斯波义信文中“杭州城垣变迁图”(在魏嵩山原图的基础上绘制)、“杭州城内娱乐施設分布图”、“杭州的都市生态区分图”,竺沙雅章文中“杭州城内寺院略图”等,本田治文中“余杭县附近水利图”等。日本学界的城市复原计划,为后续城市空间等研究奠定了基础。日本宋史研究会推出的系列论文集也收录了有关宋代临安城市史的部分论文,展现出日本宋史学界三十多年来的研究变化。^⑤80年代以后,斯波义信推出《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和《中国都市史》两部力作,前者重点讨论了南宋临安的城市生态等,在研究方法和结论方面引发学界热议。^⑥另,中村乔《宋代的料理与食品》、川胜守《中国城郭都市社会史研究》、西冈弘晃《中国近世的都市与水利》也多有涉及南宋临安城市史研究。^⑦

近30多年来,临安研究从偏于描述转向解释,这是学界交流环境改变、城市建设考述成果剧增、研究视阈转换、强调问题意识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20世纪初所提出的唐宋变革论在南宋临安研究中被论证、质疑,研究者倾向于在长时段中考察城市文明的变迁。随着城市史研究的主体性增强,城市形态与功能、空间、记忆等多元视角的引入,使研究者得以重新审视新旧文献中所不被发掘又意义非常的部分,在催“活”城市史研究的同时,也使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思想史等获得了视角转换之后的突破。与此同时,学界对西方城市史的概念及分析方法用于中国古代城市研究,对所谓框架的影响,对古代城市研究中既有模式的桎梏展开了警惕的总结和反思。

二 “中世纪城市革命”与南宋临安研究的进展与批评

百年来,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无疑是最重要的命题之一,他试图从中国内在去寻找近代化的线索,分析了唐宋之际政治、经济、文化等的转变,指出宋为近世之端。^⑧内藤假说深刻影响了日本宋代史研究的走向。南宋临安的研究最初也以宋代都市与近代化关系的探讨为背景而展开,加藤繁在《宋代都市的发展》中,提出唐宋之际中国城市经历了从传统封闭式的坊市制成为开放式的街市制的重大改变。^⑨小竹文夫则将重心挪移到两宋之际,提出“中国近代史,应从南宋始,尤其是持

① [日]梅原郁主编《中国近世的都市与文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4年版。

② [日]梅原郁《南宋的临安》,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南宋史研究中心编《南宋史研究论丛》(下),杭州出版社2008年版,第28页。原载《中国近世的都市与文化》,第1—33页。

③ 后收入竺沙雅章《宋元佛教文化史研究》,汲古书院2000年版。

④ 后收入宫泽知之《宋代中国の国家と経済——財政、市場、貨幣》,创文社1998年版。

⑤ 日本宋史研究会按不同主题编辑系列的研究报告集,包括《宋代的社会と文化》(汲古书院1983年版)、《宋代社会のネットワーク》(汲古书院1998年版)、《宋代人の認識:相互性と日常空間》(汲古书院2001年版)、《宋代の長江流域——从社会経済史の視点から》(汲古书院2006年版)等。

⑥ [日]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の研究》,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88年版;《中国都市史》,东京大学出版会2002年版。中译本由布和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⑦ [日]中村乔《宋代的料理と食品》,中国艺文研究会2000年版;[日]川胜守《中国城郭都市社会史研究》,汲古书院2004年版;[日]西冈弘晃《中国近世的都市と水利》,中国书店2004年版。

⑧ [日]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册),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0—18页。

⑨ [日]加藤繁《宋代都市的发展》,第239—269页。此文最初发表于1931年。

着近代要素的理由而划分的更应从南宋始”期望通过“述及南宋都市之状态”(临安)，“认识包含有近代要素的一部分”，他在《南宋之都市生活》中通过描述临安的人口稠密、商业繁盛、娱乐与文艺发达、豪华奢侈不再为贵族诸侯独专，推想临安的“都市生活前后之时代社会思想是起了大大的变动了”。^①除此，池田静夫撰文论述杭州与中国近世文化的关系，认为以长江溪谷为基地发展起来的近世文化，其生成的母胎就在杭州，^②又在其专著《支那水利地理史研究》中论述了唐宋杭州在地理、城址拓展、人口、运河码头的变迁。^③

20世纪50年代，宫崎市定丰富内藤假说，指出宋代经济居于世界前列。^④此后，“内藤假说”及日本学界的相关研究又传入欧美，引发持续论证与辩难。70年代，斯波义信提出“宋代经济革命”，认为在农业、交通、商业以及都市化方面都发生了重大改变，^⑤他倾向于“以都市、市场等为核心探究中国古代经济史发展的规律，在此基础上考察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变迁过程”，^⑥并以南宋都城杭州为例，从经济角度分析中国古代城市的变迁及城市经济发展对社会的巨大影响。^⑦欧美学界伊懋可(Mark Elvin)提出“中古时期的经济革命”，^⑧施坚雅(G. W. Skinner)概括“中世纪城市革命”(the medieval urban revolution)的特征(坊市分隔制度消灭、城市扩大、城外商业郊区的发展等，始于公元8世纪的唐朝，南宋时达高峰)，^⑨事实上不出日本学者的成果范围，而且有明确的论述背景和目的，包伟民在《唐宋城市研究学术史批判》文中已有辨明，但影响很大。30年代加藤繁“坊市制崩溃”的观点再次发酵，并成为该理论的基本底色，诸多教材、专著都予以采纳，研究者则力图细化完善或修正对这段时期的观察。

南宋临安研究中，除了城市建设方面以“中世纪城市革命”来展开叙述之外，主要围绕坊市制崩溃、商业发展、城市管理、人口数量及城外扩张等问题展开，略举一二。梁庚尧通过对以南宋临安为主的城市户口与城内市区的变化、城外的扩张(甚至逐渐将城外区域纳入行政系统)等分析，将“坊市制崩溃”的过程阶段化，提出唐宋城市本质的发展变化经历了：唐的北宋坊、市制的破坏期，以及坊、市制消失的进一步扩大期，即南宋城郭分割城乡作用的消逝，反映了城市的商业性质不断增强，突破了政治军事性质所构成的限制。^⑩赵冈关注南宋城外扩张的问题，据此反思学界对临安府人口数量的估算应包括户籍登记在册者、流寓者和大量住在城郊者。^⑪陈国灿以东南两浙城镇为主要分析对象，将宋以前的城市归纳为“内聚型”，即以城市为中心向内收缩的城市化特征，形成封闭的社会圈，南宋转向城乡互动型，开启了传统城市化的新阶段。^⑫龙登高指出南宋临安娱乐市场发育趋于成熟，开启了此后城市文化娱乐市场的先河。^⑬

当然，“中世纪城市变革”在南宋临安研究方面的辐射不惟政治、经济领域，如与城市规划、结构

① [日]小竹文夫：《南宋之都市生活》，岑家梧译，《现代史学》1934年第2卷第1—2期。

② [日]池田静夫：《杭州と支那近世の文化》，《支那》30卷1号，1939年。收入陈述主编《杭州运河历史研究》(第六章)，杭州出版社2006年，第368—377页。

③ [日]池田静夫：《支那水利地理史研究》，生活社1940年。

④ [日]宫崎市定：《东洋の近世》，教育タイムス社1950年版。

⑤ [日]斯波义信：《北宋的社会经济》，《世界历史大系》之“中国史”，山川出版社1997年版，第170—199页。

⑥ 游彪：《访日本经济史学家斯波义信教授》，《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第144页。

⑦ [日]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方健、何忠礼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21—374页。

⑧ [英]Mark Elvin,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Palo Alt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113—199.

⑨ [美]施坚雅《导言：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4页。有关“中世纪城市革命”说的提出、影响与争议，可参见成一农《“中世纪城市革命”的再思考》，《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宁欣、陈涛《“中世纪城市革命”论说的提出和意义——基于“唐宋变革论”的考察》，《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1期。

⑩ 梁庚尧《南宋城市的发展》，《南宋研究论丛》(上)，杭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54—315页。原载《食货月刊》复刊第10卷第10期、第11期，1981年1月、2月。

⑪ [美]赵冈《南宋临安人口》，《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2期。

⑫ 陈国灿《南宋城镇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页。

⑬ 龙登高《南宋临安的娱乐市场》，《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

功能、城市生活等相关的不少论著也同样承继这一观点。不过,学界近年开始反思加藤繁的观点,主要围绕唐都城长安的制度是否可以推及至其他城市,宋代坊墙推倒是否需要将都城与其他城市区别分析等展开讨论。^① 研究者发现“中世纪城市变革”范式下的讨论易忽略长时段观察,比如坊、市在宋代以后的发展,而研究内容则多局限于古代城市构成要素中的很少一部分等。^② 此外,王才强批评“中世纪城市革命”的命题忽视政治变革,认为中国中世纪城市生活由封闭走向开放,原因也包括皇帝独裁和贵族统治的削弱,这些开放型城市是由具有实践精神的儒家官僚所治理,宋代开封和杭州即为代表。^③ “都市自治”因关联到近代化等判断,至今也是日本学界热衷探讨的问题,2009年河原温出版《都市的创造力》,引发了日本学界对欧洲中世纪城市与宋代都市比较的讨论,山口智哉认为讨论宋代都市是否自治并无意义,即便是宋代与欧洲有相似的社会现象,由于社会形态不同也不一定真正相通,宋代都市各方势力竞争性地存在,又相互利用,恐怕更多表现为“共治”^④;山崎觉士则在书评中,以宋元杭州等城市的工商业发展、城郭规模、卫生、慈善等为例,指出学界不应过多强调经济商业,中国中世纪都市仍然是国家机构占主导的运营模式。^⑤

我们在近五年来的研究中看到上述问题在逐步获得重视,如将南宋末至元代视为长时段的变革时期透析杭州城社会经济的变化,尝试突破坊、市、城外等,将更多元素如祠庙等纳入考察。包伟民通过分析两宋城市发展、人口高度聚集对物资供应、卫生管理、消防安全等产生的影响等,提出在热衷从不同侧面论证宋代城市发展的史实之时,还应关注在此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类似今天所说的“城市病”,并藉此关注当时一般民众的生活品质、制约城市发展的种种因素,由此而催生的城市制度等新内容,保持史学研究的活力。^⑥ 毋庸置疑,对既有范式的反思和批评是推动研究进程的契机。

三 南宋临安的城市形态:从静态实体到动态变迁

20世纪60年代,凯文·林奇提出借助对边缘、区域、道路、标志等城市要素的分析,可超越文化差异而直抵城市本质。^⑦ 斯波义信在反思上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局限时,也强调城市形态分析的重要性,认为过去研究中华帝国城市史,观念上常以长安、洛阳或北京为范本,且忽略存世史料基本从官尊民卑的立场书写,难以开展本质性的城市研究,需抽取城市结构要素,灵活运用于比较分析,而“处于城市革命期的杭州和开封及其他城市,表现出超越历史面貌的种种现象”,^⑧ 讨论这些城市的形态变迁有极大的价值。

20世纪30年代,南宋临安城市要素中如“城垣”、“坊巷”等已为学者所关注。加藤繁指出南宋临安的坊,其功能和意义已发生重大变化,变为街巷之名。80至90年代,研究者拓展考述宫城、御街、城墙、官署与住宅、厢坊与瓦子、沿街街市等。南宋临安的考古发掘、日本学界的复原研究,极大推动了对城市形态的探讨,前文已述及。此外,阙维民《杭州城廓的建筑与城区的历史演变》^⑨、村田

① 包伟民《唐宋城市研究学术史批判》,第85页。

② 成一农《“中世纪城市革命”的再思考》,《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③ [美]熊存瑞《古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新成果》,第308—314页。

④ [日]山口智哉《河原温著〈都市の創造力〉を読む——中国宋代の都市空間との比較》,《都市文化研究》第12卷,2010年,第191—194页。

⑤ [日]山崎觉士《河原温著〈都市の創造力〉から中国中世都市を想像する》(由河原温所著《都市的创造力》一书想象中国中世纪都市的面貌),《比较都市史研究の新たなこころ——河原温著〈都市の創造力〉を読む》,《都市文化研究》第12卷,2010年,第188—191页。

⑥ 包伟民《试论宋代城市发展中的新问题》,(韩国)《中国史研究》第40辑(中国都市史特辑)2006年2月。

⑦ [美]凯文·林奇《城市形态》,林庆怡、陈朝晖、邓华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

⑧ [日]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第351页。

⑨ 阙维民《杭州城廓的建筑与城区的历史演变》,《浙江学刊》1989年第6期。

治郎《中国帝都的平面图形》^①、爱宕元《中国的城郭都市——从殷周到明清》^②、贺业钺《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③、郭湖生《中华古都——中国古代城市史论文集》^④、傅崇兰《城市史话》与《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⑤等都有所涉及。近年来,一些硕博学位论文也探讨了南宋临安的皇城宫苑及城市布局。^⑥然而,凯文·林奇的城市形态论也遭到辩难,认为城市形态的研究应超越静态实体,注意隐性的社会和经济结构。^⑦事实上,城市功能、结构和空间研究的兴起就带有对局限于有形的城市形态讨论的突破。斯波义信将南宋临安分为住宅区、商工区、商业区、官绅区等,并分析城市功能的实现过程,以城市生态论揭示城市形态、空间结构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等。然而,他强调城市功能需求、人口增长、商业发展等因素,同样也受到学界质疑。鲁西奇、马剑认为斯波的理论“忽视了中国古代城市的‘权力’本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城市形态、空间结构与权力运作、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经营临安的动机“是为加强正统的神秘性与维持政府所载的威严而设计”,“立基于西方城市发展经验的城市功能分区及其自然形成过程的解释,并不能较好地适应于中国古代城市空间结构的分析与解释方面”。^⑧

同样反思斯波理论并推进研究的还有高桥弘臣,他在新近发表的《南宋临安的空间形态及其变迁》^⑨中,指出以斯波为首的先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未充分论述空间形态形成的原因;虽已意识到对临安空间形态应突破静态,但对空间形态的变化(尤其是两宋之间)及原因,缺乏论证。针对第二个问题,他纵向考察从北宋杭州到南宋临安城市空间形态的变化;北宋时期,城内得到大力发展的主要是中心街道、盐桥运河一带以及中心街道以西,及至南宋,盐桥运河以东的区域开始发展,临安的发展从西往东推移;南宋临安,呈南北走向的中心街道及盐桥运河、河道作为城市的基本轴线保留,在强化御街政治、商业意义之时,增加了财政、祭祀、军事等功能;南宋临安府治、运输等职能部门设置于涌金门内侧,其结果就是与府治、御街相邻的街道,通行人流和物资数量增加,由此形成东西轴线,因此南宋临安,除南北方向,还形成东西方向的城市轴;高桥还探讨了临安城外空间形态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此前他曾在《南宋临安的三衙》^⑩、《南宋临安禁军驻屯及其影响》^⑪等文中有所论及,并且在《南宋临安城外的人口增长与都市领域的扩大》中,突破过去研究中片段描述的局限,详细分析了宋代人口增加和与之相应的行政措施管理下的大都市临安城外的情形与布局。^⑫

除了坊、市、城墙等讨论集中的城市形态元素之外,祠庙等也为研究者所关注。伊原弘以祠庙为切入点,认为临安诸神与都市有着密切的联系,体现在临安诸神与外来流入者、诸神庙与周围居住者、诸神与祭祀主体的关系等方面,提出“对都市诸神的分析,不仅仅是指出都市形态的变化,同

① [日]村田治郎《中国帝都的平面图形》,《中国的帝都》1981年版。

② [日]爱宕元《中国的城郭都市——从殷周到明清》,中公新书,1991年3月。该书是继村田治郎的《中国的帝都》之后比较完整的中国城市发展史,采用了彼时中国最新发表的考古成果,徐苏斌认为,村田侧重于自己考察过的内容,事实上是他的论文集,爱宕元则更接近通史的写法。参见徐苏斌《日本对中国城市与建筑的研究》,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9年版,第213页。

③ 贺业钺《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年版。

④ 郭湖生《中华古都——中国古代城市史论文集》,台北空间出版社1997年版。

⑤ 傅崇兰《城市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傅崇兰《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⑥ 如张劲《两宋开封临安皇城宫苑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历史系,2004年;李利军《南宋临安城景观布局初探》,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2011年。

⑦ 周玉明《城市形态的认知》,《苏州大学学报》(工科版)2006年第5期。

⑧ 鲁西奇、马剑《空间与权力:中国古代城市形态与空间结构的政治文化内涵》,《江汉论坛》2009年第4期。

⑨ [日]高桥弘臣《南宋臨安における空間形態とその変遷》,《爱媛大学法文学部论集(人文学科编)》33号,2012年,第1—40页。

⑩ [日]高桥弘臣《南宋臨安の三衙》,《爱媛大学法文学部论集(人文学科编)》26号,2009年,第57—87页。

⑪ [日]高桥弘臣《南宋臨安における禁軍の駐屯とその影響》,《爱媛大学法文学部论集(人文学科编)》27号,2009年,第75—107页。

⑫ [日]高桥弘臣《南宋臨安城外における人口の増大と都市領域の拡大》,《爱媛大学法文学部论集(人文学科编)》23号,2007年,第113—146页。

时还是对都市内部社会结构进行解析相联的一条重要线索”^①，比如水神信仰的发展，就是都市化过程中，外来人口增加，超出城市容纳力而向溢出，在钱塘江和城墙之间形成聚落的结果。

由此可见，近年来日本学界反思既往讨论框架，尝试着将细节考释和城市形态动态变迁结合起来推进研究，并试图引入其他的城市形态元素如祠庙等展开分析。相较而言，中国学界对南宋临安城市形态的研究，无论是城市要素的选取，抑或动态变迁的分析，对既有模式的批评都有待拓展。^②

四 南宋临安的城市空间：与政治史、文化史等交错

城市空间是南宋临安研究中后起的领域。日本以宋史研究会为主体，兴起人际“场”与文化设施的研究，主要从政治权力与城市空间关系方面展开探索，讨论君、相权之间的关系，试图超越“君主独裁政治论”。平田茂树注意到秦桧为掌握权力，对临安宫殿的内朝、外朝、经筵这三个与皇帝日常活动相关的空间作了精密的安排，皇城内政治空间的复原有助于了解执政过程，研究者可从政治空间的关系来探讨决策过程，衣川强也留意到宰相住宅和宫城间的距离对政治的影响，平田指出考察德寿宫、专权宰相居宅及宫城共同形成的政治空间，有助于推进南宋政治史的研究。^③此外，特定时空的礼仪活动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如金子泰晴《建炎年间宋金的边防及其背景——以李纲和张俊的巡幸论为中心》^④、高桥弘臣《南宋初期的巡幸论》^⑤、《南宋的皇帝祭祀与临安》等。^⑥曹家齐以南宋临安府周围的邮传系统为视角观察宋室南渡之后的军事部署和政治状况。^⑦

思想文化方面，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 Stephen H. West（奚如谷）以身体、礼仪与宫苑为切入点探讨宋元城市生活，他对笔记及文学文献的细读，角度新颖。^⑧赵嗣胤从礼法维度对临安展开讨论，聚焦南宋临安的礼仪空间、皇帝行幸、垣墙界限，并由此探讨皇帝、士大夫和都人的行为和互动，分析作为观念制度的礼法与实际礼仪活动、城市生活之间存在的紧张调适与妥协。^⑨

社会生活方面，张晓虹等认为功能分区主要反映空间的静态表现，忽视了城市中个人的空间行为及由此产生的城市空间的动态特征，提出可将功能分区与时间地理法结合起来研究南宋临安，分析节日活动的时空结构。^⑩原瑠美提出南宋临安城外的研究有待拓展，尤其是西湖在都市空间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她在《作为共有空间的西湖：从西湖和南宋临安居民的关系出发》文中探讨了两宋西湖所承担的社会机能的差别。^⑪

文学艺术方面，大塚秀高另辟蹊径，指出故事表述有时随时间和场所的推移而发生变化，“一窟鬼”故事把杭州郊外的鬼域作为标界，杭州改称临安后，郊外的都市化发展，使它的舞台也从靠近火

① [日]伊原弘：《南宋初期临安的形——从祠庙分析入手》，《国际宋史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四川大学古籍整理所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② 中国学界关于古代城市形态的研究情况可参见成一农《中国古代地方城市形态研究现状评述》，《中国史研究》2010年1期。

③ [日]平田茂树：《宋代城市研究的现状与课题——从宋代政治空间研究的角度考察》。

④ [日]金子泰晴：《建炎年间宋金的边防及其背景——以李纲和张俊的巡幸论为中心》，《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纪要别册》20，哲学、史学编，1993年。

⑤ [日]高桥弘臣：《南宋初期的巡幸论》，《爱媛大学法文学部论集（人文学科编）》15号，2003年，第37—77页。

⑥ [日]高桥弘臣：《南宋の皇帝祭祀と臨安》，《东洋史研究》69卷4号，2011年，第89—121页。

⑦ 曹家齐：《南宋临安府周围之邮传路线及其功能》，《文史》2008年第3辑。

⑧ [美]Stephen H. West, “Body and Imagination in Urban Gardens of Song and Yuan,” in Michel Conan, ed., *Gardens and Imagination: Cultural History and Agency*, Washington, D. C.: D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and Collections, 2008.

⑨ 赵嗣胤：《南宋都城临安：礼法视野下的古代都城》，硕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历史系，2011年。

⑩ 张晓虹、牟振宇、陈琍、丁雁南：《南宋临安节日活动的时空结构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3卷第4辑，2008年10月。

⑪ [日]原瑠美：《共有空間としての西湖：南宋臨安居民との關係から》（第50届史学研究会大会报告），《史林》53号，2012年，第65—68页。

葬场的慈云岭转移到了寺院云集而死后变为怨灵的济王坟墓附近的驼岭。^①李慧漱借助绘画作品和古地图重建临安的实质地理空间,^②指出临安皇城大内,以凤凰山为护背,事实上是“坐西朝东”的东西走向,“也许是为了掩饰皇城中轴走向的缺失,临安皇城图的绘制者,巧妙地将地图制作一般规制上‘上北下南’的方位设定,改为‘上西下东’”,^③认为地图是一种文化建构,通过特殊试点来引领界定观者的视野,貌似客观却隐微表达着政治权力的运作。

总的来说,近十年来,中国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城市空间研究,并强调“城市空间应具有多重性和多维性”,如宁欣提出城市空间概念的三个层次,包括“地域空间,如城市区划、布局、建筑等;社会与政治空间,如居民结构、社会结构、社会流动、城市管理制度等;精神空间,如城市文化、城市社会心理、城市观念等”。^④这种观念在对唐长安和北宋开封的研究得到了呈现,积累了具有拓展意义的研究成果,相对而言,中国学界对于南宋临安的城市空间研究还有待发掘。

五 从开封到临安:两宋都城的比较研究

北宋东京(开封)和南宋临安皆为宋朝的繁华都会,君臣南渡、宋分南北的特殊历史,使开封与临安的比较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可藉此探讨城市建设及制度的沿袭与折中、政治权力的重组、经济及社会生活的变迁、移民文化的影响等。学界目前主要从城市建筑、城市风俗与节日(包括宗教)、城市记忆等方面展开两座城市的比较研究,其余零散的比较内容,兹不赘述。

早在20世纪30年代,全汉昇就曾论述宋代东京对南宋临安都市文明的影响,认为与欧洲中世纪商贩带动信息传播和城市的发展相异,宋东京对南宋临安的影响主要是由于宋室南渡的政治原因,从饮食、衣饰、娱乐等略举数例以证。^⑤曾我部静雄在《开封与杭州》中简要描述了两座城市的繁华景象。^⑥James M. Hargett(何瞻)介绍了开封和临安的娱乐场所和空间。^⑦程民生略举饮食、文娱、节日习俗,以证“汴京侨民,模仿着东京故事,再造着大宋王朝”,^⑧指出原因在于名号为“行在”,对北宋朝廷的认同和怀念,与遵从祖宗之法等。妹尾达彦认为南宋临安是将往昔的小城市扩建为都城的范例,它以回归开封为前提建设的临时首都(行在),展现了不同于其他时代的建筑风格。^⑨吴松弟从移民文化的角度分析了南宋临安都城移民的类型和南北都市文化的变迁。^⑩徐吉军较细致地从衣食住行、岁时节日、诞生与婚丧、宗教信仰、语言等多方面论述了北宋中原风俗对南宋浙江,尤其是临安的影响。^⑪宗教信仰方面,段玉明以南宋杭州的开封宫观为例,探讨宗教文化的转移中文化元素与特定信仰群体之间的联系等问题,认为开封宫观在杭州的复建,多与帝国政治结合紧密,是帝国政治连续性与合法性证实的舞台,帝国与皇室安危的心理保障。^⑫鲍志成考述了宋室南

① [日]大塚秀高:《宋代社会と物語》,《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29,1996年,第119—161页。

② 李慧漱:《南宋临安图脉与文化空间解读》,《区域与网络:近千年来中国美术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2001年版,第57—90页。

③ 《南宋临安图脉与文化空间解读》,第62页。李慧漱文中曾对今藏于美国Freer博物馆的《西湖清趣图》有所分析,最近由此图创作者和年代的热议,李文再次受到研究者关注。

④ 宁欣:《转型期的唐宋都城:城市经济社会空间之拓展》,《学术月刊》2006年5月。

⑤ 全汉昇:《宋代东京对于杭州都市文明的影响》,《食货》1935年第2卷第3期,第31—34页。

⑥ [日]曾我部静雄:《开封と杭州》,《中国历史地理丛书》第7辑,富山房,1940年。

⑦ [美]James M. Hargett:《The Pleasure Parks of Kaifeng and Lin'an During the Sung Dynasty (960—1279)》,载《国际宋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8年。

⑧ 程民生:《汴京文明对南宋杭州的影响》,《河南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

⑨ [日]妹尾达彦:《長安の都市計畫》,讲谈社2001年。

⑩ 吴松弟:《南宋移民与临安文化》,《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

⑪ 徐吉军:《北宋中原风俗对南宋浙江的影响》,《南宋史及南宋都城临安研究(续)》(上),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73—496页。

⑫ 段玉明:《南宋杭州的开封宫观:宗教文化转移之实例研究》,《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渡与神祇随迁之间的关系。^①

城市记忆是城市形成、变迁和发展中具有保存价值的历史记录,是人们对这些历史记录以信息的方式加以编码、储存和提取过程的总称。梁建国由此探讨了宋人的开封记忆如何在南渡临安再现与延续的问题,分析了开封城市景观在临安的仿建与风俗移植,认为临安城融入了汴都文明的诸多元素。除此之外,南宋人还以口述笔传和文献搜集汇编的两种形式持续建构开封记忆,特别注意到北宋开封人和南宋人叙述的身份、立场与内容之别。^②这启示我们在研究临安城市史之时,应强调对文献语境进行分析甄别。近年,文学中的“双城记”也日益为研究者所关注。宋莉华比较了小说中两宋汴州与杭州的双城描述^③,而孙逊、葛永海则注意到从两宋到明清汴州与杭州的双城意象变迁^④,刘方在博士论文《宋代两京都市文化与文学生产》中从故都记忆文学发生的历史语境、故都记忆的物质基础与临安城市文化的故都痕迹和故都的文学想象等方面,揭示文化记忆与文学想像中的故都,提出并细致分析临安都市文化繁荣催生了近代意义的新型文学生产的萌生。^⑤

应该说,20世纪90年代前的研究多停留于描述,显得简单。之后才开始将现象罗列铺陈提升至城市比较研究,藉此探讨南宋政府再造临安的政治和文化诉求等,及文学中故都情结的缔造。

六 南宋临安城市史的展望

材料与问题的确是史学,甚至也是其他人文社科研究永远的挑战,当我们以此检视南宋临安的研究,仍有如下方面需特别注意:

第一、新旧研究材料的利用问题。近20年来,在南宋临安城市考古方面虽取得突破,然而并未合理充分地研究者所用,而传世文献,则仍需加强收集与细读。从日本学者论文“引言”说明的文献利用来看,许多新近研究大多充分发挥了对基本史料的分析,只是由于观察和分析角度不同而使材料信息有了崭新的解读。第二、在研究南宋临安或其他城市个案时,应对古代城市研究的某些既有模式保持警醒。上世纪90年代,伊原弘曾指出城市研究中偏重确立在王朝史中的地位和繁荣而忽视演变兴衰,至今我们看到研究路径日趋多元,尤其在城市形态与空间等方面的拓展有力推进了对变迁的探讨。然而,研究者对目前城市研究中上述新方向也提出了新的反思,认为“在内容选择上基本上受到城市形态综合研究或者研究习惯的制约,主要集中在城墙所界定的城市外部形态的变化、街道、商业、某些衙署等少量内容上”,“研究之前就已经以综合研究的成果作为个案城市研究的结论,丧失了应有的客观分析”。^⑥总之,保持反思并从材料出发,才能不断推进研究。随着对“中世纪城市革命”的学术史清理,南宋临安的研究也应该进入新的阶段。此外,南宋临安研究中,还应注意城郊关系,着眼于城市对这些区域的辐射、吸收和地缘背景,在东南城市群的大范围中展开观照,甚至可以关注东亚视野下的城市互动等。事实证明,将城市史引入经济史、政治史研究,促使新史料的充分利用和视角转换下旧史料的重新审视,将弥补传统研究中的不足。

(本文是杭州师范大学城市学研究所项目“南宋临安的都城空间与礼仪开展”(编号:2012CSX21)的研究成果。感谢日本茨城大学井泽耕一先生、王珏人女史提供资料复印的帮助)

(责任编辑:初阳)

① 鲍志成《南宋临安宗教》,杭州出版社2010年版。

② 梁建国《东京梦华:南宋人的开封记忆》,《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11年第4期。

③ 宋莉华《汴州与杭州:小说中的两宋双城记》,《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7辑,2002年,第175—194页。

④ 参见孙逊、葛永海《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东京故事”》,《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孙逊、葛永海:《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双城”意象及其文化蕴涵》,《都市文化学科建设论坛暨都市文化原理编写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年;孙逊、葛永海《“双城记”: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城市意象谱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9年。

⑤ 刘方:《宋代两京都市文化与文学生产》,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2008年。另可参见刘方:《汴京与临安:两宋文学中的双城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⑥ 成一农《中国古代地方城市形态研究方法新探》,《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Reforming from the Bottom: to build a historical conception in line with Chinese actuality

JIANG Yi – hua

For over 100 years , Chinese historians have done a lot to interpret the historical course of China. However , many of our ideas and analytical frameworks are directly borrowed from the west or came through Japan to the west before they reached China. These new concepts and frameworks promoted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ew historiography , but in the meantime prevented them from revealing the historical actualities of China in its true sense.

Researches into Lin' an of Southern Song Dynasty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City History (1920 – 2013)

YAO Yong – hui

Song dynasty is a turning point for ancient Chinese cities or even for the history development of China. With more scholars nowadays paying increasing attention to the history of Song dynasty , the research value of Lin' an , capital of Southern Song Dynasty (1127 – 1279) was prominent.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studied relevant literature during a hundred years and focused on discussing the hot issues after the 1970s and in the meantime introduced the latest research results by overseas scholars.

Seemingly harmonious: Modern Chinese New Historiography and Japanese History

LIU Chao

The Chinese – edited history text book in End Qing Dynasty was the initial practice of New Historiography which referred to Japanese Text Book in the compilation of the Genre. Self – edited Text Book practiced the requirements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er to write the National History with the theory of evolution and settled the direction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葛鉴瑶 译)